

第二章 十九世紀後半期俄羅斯社會與藝術發展之時代背景

“俄羅斯可以沒有我們，
我們卻不能沒有俄羅斯。”

- 屠格涅夫

第一節 十九世紀後半期俄羅斯知識份子的角色認定及其時代氛圍

十九世紀後半期俄羅斯社會的獨有現象是知識份子的角色特殊性及其革命思想之氾濫，其所主張之理念除了產生政治制度上之革新，對文化藝術界更帶來一股前所未有的批判現實主義風潮與愛國意識之抬頭。因而在論述十九世紀後半期的社會背景概況時，本章節將以俄羅斯知識份子之角色對社會發展所產生之影響作為論述主軸，同時分析在革命思想蓬勃發展的同時，社會上另一股以道德觀作為社會改革基礎之暗流思想的蔓延。兩股勢力代表著不同的精神世界觀，卻是源生自同一股愛國救贖主義，探究其中交互影響所激盪出之思想理念，將構成此論文行文之重要社會背景。

一、俄羅斯知識份子之定義

俄文“知識份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詞直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才由包勃黎金（П.Д. Боборыкин, 1836-1921）引入俄文，並透過屠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不斷在作品裡運用而廣為流傳，這樣的用字在此刻出現，確實有它獨特之時代意義，因為當時俄羅斯社會階層逐漸瓦解，出現了一群“平民知識份子”（разночинец），他們的思想理念與行動力為十九世紀後半期二十世紀初期的俄羅斯帶來空前之震撼。然而由於俄羅斯知識份子並非一般所認知的“有知識教育者”，而是一種意識型態之組合，且其角色特殊性導因於沙皇專制制度、農奴制度與東正教信仰之傳統政治文化的交互融合影響，因此在如此複雜的社會背

景因素下，自然很難予以知識份子確切之定義。再加上隨著時間與歷史事件之演進或者從道德良知來重新審視，似乎又會對俄羅斯知識份子產生重新之理解，因而對於“什麼是知識份子？”這樣的問題總是不斷的被提出來討論。例如《路標》（«Вехи»）集的作者們認為，知識份子的典型人物是在政治、美學、道德方面具有激進思想的別林斯基（В.Г. Белинский, 1811-1848）、杜勃羅留波夫（Н.А. Добролюбов, 1836-1861）、車爾尼雪夫斯基（Н.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828-1889）與彼薩列夫（Д.И. Писарев, 1840-1868）及其追隨者等⁵。下面是擷取這些知識份子典型人物談話中對於俄羅斯知識文化的獨特歷史意義，以及他們對自我角色的認定與實踐之理念：

1. 站在革新歷史議題的立場上，以批評的方法來評斷每個社會事件或制度；
2. 在道德最高主義與期望下，知識分子必將個人利益置於公眾利益下，根據個人對於自由進程的貢獻來對待他們，並竭盡其力加速公正社會的到來；
3. 以先驅者的活動或信仰號召有教養、有良心、並具有批評意識之個人來領導苦難群眾對抗專制與過時的政權；
4. 對於那些因被專制政權壓迫，而無法訴諸內心不滿或無法理解自身苦難根源的群眾，寄予意識型態之憐憫；
5. 以政治、社會與經濟平等之計畫性承諾，作為歷史上最具有效益與人性的社會生存形式；
6. 基於政府對於社會重建之公開自由言論與合法集會的壓制，階級暴動之罪惡為必然行為；
7. 當權政府對於言論自由之壓迫，導致知識份子言論與行動之分裂；
8. 以諷刺的態度對待當權者，並嘲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強調俄國知識

⁵ 劉煜卿，俄羅斯知識份子的悲劇，俄羅斯文藝，北京，2002年4月，頁49。

分子對於其必須扮演的公眾角色，與其嚮往之理想個人角色有所隔閡；

9. 將反對官僚社會或市儈習氣之抗議形式表現在日常家庭生活、朋友關係以及藝術品味上等等；
10. 視藝術和文學為塑造公眾意見以及宣傳社會主義理念和意識型態之強有力的媒介。⁶

美國學者摩森（Gary S. Morson）教授，在他的文章《什麼是知識份子？再一次一個老舊的俄羅斯問題》（«What is the intelligentsia? Once more, and old Russian question»）當中也認同上述的觀念，而對俄羅斯知識份子列舉出如下的定義：

1. 知識份子擁有獨特的信仰，此信仰因團體與年代而不同，但是都不出社會主義、無神論與革命行動這些理念範圍。因而一位毫不識字卻擁有上述特質理念以及亟欲推翻政府者，比起一位自由派的大學教授更有資格稱為“知識份子”；
2. 身為知識份子，其行事風格具有某些特定的準則，例如鄙視迂腐官僚的一切。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烏托邦小說《怎麼辦？》（«Что делать?», 1863）當中男女主角的行為，是十九世紀後半期俄羅斯知識份子爭相模仿之典範。⁷

顯然上述對於俄羅斯知識份子的定義正是指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後，積極鼓吹激進革命運動之代表者。然而，美國學者派佩斯（Richard Pipes）教授對俄羅斯知識份子的定義提出更詳細且不同於前述之解說。他認為知識份子包含有廣義與狹義兩種意涵，廣義而言，是指受過教育階層裡享有公共威望的成員。不過，久而久之，此詞從描述性與客觀性，變成以規範性與主觀性為主。1870 年代，俄羅斯抱持激進的哲學、政治、社會見解的年輕人堅持只有他們才符合知識份子之名。此詞演變至 1890 年代，“一個俄國人只受過教育、在公眾生活裡扮有一角，

⁶ Dmitri N. Shalin, *Russian culture at the crossroads: paradoxes of postcommunist consciousness*, p. 52.

⁷ Gary S. Morson, *What is the intelligentsia? Once more, and old Russian question*, *Academic Questions*, 2004, Vol. 6, Issue 3, p. 50.

已不足成為知識份子，他/她必須堅持反對舊體制的整個政治與經濟制度”，換言之，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等於當個革命份子。⁸但是，派佩斯教授同時從道德的觀點提出，上述定義的知識份子其實是一群“對於權力渴求的知識份子”、“以道德之名行政治之實”⁹。派佩斯教授更進一步說明，事實上，俄羅斯知識份子所指涉範圍比想像中的更為混亂。因為儘管許多抱持自由主義者或堅持保守主義者他們並不接受革命的意識型態，但卻反抗當時的獨裁政權。倘若將這些人排除在知識份子的定義之外似乎不夠完善。為求確實，派佩斯教授便以“謀求公眾福利的獻身感”為標準認為：身為知識份子，不只完全關心個人福祉，至少還同等關懷，或更加關懷社會福祉，並且願意盡力謀求社會人民的福利”¹⁰。派佩斯教授的觀點顯然認為，不單只有十九世紀後半期奉行革命主義者，才有資格被稱為知識份子。他的論點，我們可以從德里克（Offord Derek）教授對於知識份子的定義再做補充，德里克教授強調知識份子的“批判意識與社會責任”，他對知識份子的定義如下：

1. 知識份子並不認同專制政權所建立的價值觀，而有自己獨立的思考，是“具有批判意識之少數”；
2. 基於知識份子的獨立思考能力，他們在某些形式：哲學、文化、道德、宗教以及政治態度上與專制政府相對立；
3. 由於知識份子必須與暴力相對抗，因而他們最好“與權力隔絕”。但是這一點所產生的後果可能是：知識份子與權力隔絕將可以杜絕腐敗，達到國家理想境界；但也可能是：知識份子無須對他們提出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解決方法負任何責任；
4. 同樣的，知識份子作為反對政權者的角色，必須願意為他們所堅持的理念遭受苦難與迫害，迫害可以是輕微的，例如恰達耶夫被視為神經病、萊蒙托夫被流放至高加索以及屠格涅夫被流放回他的鄉下；迫害也可能

⁸ Richard Pipes,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New York: Columbia, 1961, p. 48.

⁹ Richard 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1991, p. 126.

¹⁰ Richard Pipes,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New York: Columbia, 1961, p.48.

是殘忍的，例如五名十二月黨人以及車爾尼雪夫斯基被處死、杜斯妥也夫斯基被流放至西伯利亞等。¹¹

從派佩斯與德里克兩位教授的定義看來，他們對俄羅斯知識份子的定義，更廣泛的包含了自彼得大帝（Пётр I, 1672-1725）西化之後所產生的貴族思想革命家以及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保守、激進主義者等。除了上述，俄羅斯哲學家對於知識份子的看法也自有一套定義，別爾嘉耶夫（Н. А. Бердяев, 1874-1948）曾在《路標》集當中寫到：「別林斯基是俄羅斯知識份子的父輩之一」，布爾加科夫（С. Н. Булгаков, 1871-1944）也附和這樣的看法¹²，但是後來別爾嘉耶夫卻又說道：「俄羅斯知識份子的始祖是拉吉舍夫（А. Н. Радищев, 1749-1802），他預見到並確定了俄羅斯知識份子的基本特點。當他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Путешествия из Петербурга в Москву»）中說：“看看我的周圍—我的靈魂由於人類的苦難而憂傷”時，俄羅斯的知識份子便誕生了。¹³別爾嘉耶夫同時指出，知識份子的組成，來自不同社會階層之集合，一開始是貴族佔有優勢，後來則是平民知識份子居多。多餘人、懺悔貴族或者是後來的積極革命者，這都是實際存在的知識份子之不同成分。¹⁴而二十世紀俄羅斯作家梅烈日科夫斯基（Д. С.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866-1941）則不只一次重複的堅持：「第一個俄羅斯知識份子彼得大帝。他的面貌如刻在銅幣上那樣，清晰地印入俄羅斯知識份子的血肉中。彼得的合法繼承人，彼得的孩子—就是所有我們這些俄羅斯知識份子。他中有我們，我們中有他。」¹⁵思想家費多托夫（Г. Н. Федотов）甚至把時間點推向更前，他認為古俄基輔時期與莫斯科時期的東正教神甫、僧侶及編書者是俄羅斯第一批知識份子。¹⁶

每個人對於俄羅斯知識份子的定義皆從不同的認知與分析角度來闡述，因而

¹¹ Offord Derek,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opposition to autocracy, New York: Longman, 1999, pp. 10-11.

¹² 劉煜卿，俄羅斯知識份子的悲劇，俄羅斯文藝，北京，2002年4月，頁49。

¹³ 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三聯書局，2004年，頁27。

¹⁴ 同上，頁26。

¹⁵ 劉煜卿，俄羅斯知識份子的悲劇，俄羅斯文藝，北京，2002年4月，頁49。

¹⁶ 同上。

對於什麼時候出現第一位知識份子，以及誰才是知識份子，而誰又不應該屬於知識份子之列這樣的問題自然形成各家之言。本章節的論述重點為十九世紀後半期俄羅斯知識份子的身份特殊性以及他們如何認定自我角色，對於“知識份子”的定義則綜合上述觀點，認為俄羅斯的知識份子最早出現於十八世紀知識社會逐漸開展的俄羅斯。由於俄羅斯西化運動的主要接納對象為上層社會的貴族，因而俄羅斯的知識份子最先由貴族組成，而後由於教育逐漸普及，再加之以俄羅斯的階層分級逐漸瓦解，平民知識份子遂成為俄羅斯知識份子之中堅。出生階級與社會氣氛之迥異，本來就會造成貴族知識份子與平民知識份子作為上之差別，但是在本質上，他們屬於同一個靈魂，同為熱愛祖國土地並為人民奉獻，或以思想、或以行動。下面，我們首先從俄羅斯知識社會之擴展來闡述貴族與平民知識份子之起源及差異。

二、俄羅斯知識份子之源起

傳統俄羅斯根據個人的出生與繼承，主要將社會分為特權階層（привилегированные сословия）及賦稅階層（податные сословия）。前者包括貴族階層（дворянство）、教士階層（духовенство）與商人階層（купечество）；後者則包括小市民階層（мещанство）與農民階層（крестьянство）。每個階層所享有的權利或應該履行的義務都由國家嚴格控管，如此一來，便構成俄羅斯嚴格的階層分級。然而在彼得大帝的積極西化過程當中，舉凡制度、教育、服飾、文化生活等改變，大多只對上層貴族的生活方式產生影響，廣大的農民低下階層依然按照舊社會傳統生活，因而逐漸加劇俄羅斯上下階層的生活與思想分裂。儘管此時彼得大帝大量派遣年輕貴族前往歐洲學習，但他們所觸及的範圍多強調國家制度的建立以及軍事、工業、科技等方面之學習，彼得大帝西化的重點著重在技術制度上更勝於思想上，他欲藉助西方社會已發展的現代化設備制度快速發展俄羅斯，他的意圖只是要讓社會對國家更有用，藉此來支援其他改革，因而當時擁有知識的貴族，並非如同西方社會的知識份子般具有政治自由或憲政體制等概

念，同時能對時政提出批評，他們頂多只能被稱為“官僚貴族”，即一批為國家服務的貴族，他們具備為國家服務之義務，以換取政府授予土地與農奴之擁有權利，貴族階層實際上雖在人身自由上受到國家相當程度的約束，不過這樣的貴族身份束縛很快得到解脫。1762年，彼得三世（Пётр III, 1728-1762）解除了貴族對國家的服役義務，他們從此擺脫對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1785年凱薩琳大帝（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時期頒佈的《貴族特權詔書》（«Жалованная грамота дворянству»），更對貴族階層施以仁政賦予他們更多的自由與權利，從法律上確定了貴族是俄國的特權階層，這個階層不承擔任何國家義務，除去圖謀反對沙皇的罪名之外，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和處罰。凱薩琳大帝是當時歐洲奉行“開明專制”（Просвещённый абсолютизм）的君主之一，她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歐洲啟蒙主義思想在俄羅斯的傳播。而當時的貴族擁有更多自由生存的能力，開始到西方接受教育或旅行，同時有更多閒暇接觸西歐經典。隨著閱讀習慣逐漸在當時的俄羅斯上層社會開展，啟蒙主義精神中強調之個人權利與多元化之知識思想在無形中一點一滴植入上層貴族的世界觀裡¹⁷。蘇聯時期的藝術評論家盧那察爾斯基（А.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1875-1933）論述到俄羅斯貴族成長的社會環境與文化條件時說道：「在我們這個半亞洲的泱泱大國裡，我們的大貴族甚至是中等貴族，騎在為他們服役、任他們擺佈的農民的佝僂背樑上，擁有大量的物質財富…他們愛好打獵，常在平原和田園上消磨時光，無論是多雪的冬天或炎熱的夏季，他們總能呼吸新鮮的空氣，呼吸他們田野和森林中的空氣。同時，這些人又出國旅行，會說四、五種語言，吸收西方所有最精緻的東西，用大理石雕像裝飾自己的花園，在優美的莊園中聆聽貝多芬的音樂，欣賞第一流外國作家和其他著作。」¹⁸當時凱薩琳大帝提倡文學創作，書報檢查制度也一度較為寬鬆，拉吉舍夫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諾維科夫（Н. И. Новиков, 1744-1818）的諷刺雜誌《雄

¹⁷ Marc Raeff, *Origins of Russian Intelligens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6, p. 78.

¹⁸ 孫乃修，屠格涅夫傳，台北，業強出版社，1992年，頁7。

蜂》(«Трутень»)、《畫家》(«Живописец») 以及馮維津 (Д. И. Фонвизин, 1744-1792) 的諷刺劇等都是在此種特殊的環境下出版。與此同時，俄羅斯的上層社會逐漸發展出與專制制度相違背的意志，同時出現了一些獨立的見解，貴族們要求在更大程度上的經濟獨立，逐漸，俄羅斯上層貴族與沙皇之間的和諧關係產生裂縫。1774 年普加喬夫¹⁹ (Е. И. Пугачёв, 1740-1775) 被逮捕時曾說：我不是獵物，我不過只是剛學會飛的小鳥，真正的獵物還在天空盤旋著²⁰。言下之意，正是俄羅斯將會出現一股更巨大的力量威脅沙皇政體，這股力量的促成因素則是來自“具有批判思維能力的知識份子”。

三、十九世紀前半期俄羅斯貴族知識份子

除了彼得大帝與其後沙皇之西化政策，在加之以俄羅斯持續受到鄰近歐洲啟蒙理性主義之影響，促使其知識社會思想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專制暴政與農奴制之不公現象，遂成為知識份子批判之對象，第一批反抗者由貴族知識份子首先發難，他們深切意識到人民的悲苦，滿懷理想欲將之從專制當中解放，但是他們卻與處在社會底層的廣大農民格格不入。在農民的眼裡，知識分子的角色就是貴族，正是農民急欲起義消滅的對象。長久以來，在俄羅斯農民的思想意識中，他們的苦難根源是來自於地主貴族的壓迫與剝削，農民們期望有一天他們所敬愛的沙皇能夠來救贖他們，沙皇對他們而言，是“公正仲裁者”的象徵、是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人。有了這一層關係，儘管知識分子們認為“我們”自己與“他們”那些特權貴族並不相同，但是就農民而言，知識分子也好、貴族也好，並沒有任何差別。1825 年的十二月黨人事件，清楚地反映出這樣的事實。十二月黨人基本上都是貴族，又大多是青年軍官，他們接受法國啟蒙思想家的學說，當他們參加對抗拿破崙的遠征時，到過已經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西歐國家，他們發現與西歐現代化的城市景象相較，俄羅斯現存的農奴制度極為落後，再也沒有任何地方像

¹⁹ 普加喬夫之亂為 1773 年到 1774 年間俄羅斯的農民暴動事件，普加喬夫為此次動亂之首。

²⁰ Richard Pipes,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New York: Columbia, 1961, p. 7.

窮苦的俄羅斯人民遭受這般的壓迫。在探討俄國人民受苦難的原因時，這些貴族青年軍官產生了強烈要求社會改變的願望，他們從上層官僚階層中獨立出來，將個人利益拋諸崇高的理想之後。一位當時參與戰爭之軍官回憶起西歐進步的文化社會對他的同僚們所產生的印象：「在參與對德、法戰役之時，俄羅斯年輕人認識到西歐城市文明，並強烈感受到家鄉的一切：被奴役的俄羅斯人民、小市民的卑微、暴政之濫用…這一切燃起了俄羅斯年輕軍官們的愛國情操。」²¹十二月黨人雖然有推翻沙皇專制制度與消滅農奴制度之崇高理念，但他們的反叛不具廣大群眾的基礎，顯然他們只是在做“貴族的革命”，而非“人民的革命”。列寧曾提及：「…我們清楚在俄羅斯革命當中看到三個世代、三個層級。第一個世代來自貴族，即十二月黨人的起義。他們的範圍是狹隘的，他們遠遠的疏離人民…」²²為了解除人民的苦難，十二月黨人主張廢除專制與農奴制度，但是他們對於農民的理解，事實上卻是一種錯誤的認知。僅管十二月黨人與俄羅斯廣大農民們腳踩同一片土地，卻似乎吸取著不同的養分。顯然的，這些自由主義者的革命理念完全移植於西歐思想，他們並未真正瞭解自己的人民需要的是什麼。生長在單純的務農世界裡，俄羅斯農民無疑賴以土地為生、同時虔誠地景仰他們的母親大地，而虛幻的名詞“個人自由”對於他們而言似乎毫無存在意義，對於俄羅斯精神之詮釋，集體的觀念遠比個人主義來得適切²³；再者，失去與土地的依存，俄羅斯多數農民將被迫另謀他職，也是他們所不願意的。因而十二月黨人之起義，最終勢必鎩羽而歸。然而儘管其行動失敗，但卻產生重要之象徵意義，對於專制政府所引發的窒息感以及改革意識已經蔓延在帝國陳腐的空氣當中。

十二月黨人革命之後，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推行多項反動措施和封閉政策，尤其在文化思想界上嚴厲實行審查制度，目的就是要扼殺一切自由思想、實行嚴酷的思想禁錮以及剝奪貴族知識分子的正當活動。在高壓恐怖

²¹ Anatole Mazour, *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 1825, The Decembris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55.

²² Yarmolinsky Avrahm, *Road to Revolution: a century of Russian Radicalism*,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p. 102.

²³ Tim McDanie, *The Agony of the Russian idea*,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5.

統治下，釀成了俄羅斯內部知識份子怒而不言的沉默局面。擁有進步改革思想的貴族知識份子確沒有改革的行動力，其內心的掙扎與矛盾正如赫爾岑（А. И. Герцин, 1812-1870）所說：對於他安身立命的環境而言，這些貴族出生的青年知識分子受到西方進步思潮的影響，因而對自己所處的環境產生了懷疑和不满。但是他們既沒有也無法提出新的社會理想或未來發展的理想道路，就這樣，他們在生活中找不到立足點，並且因為意識到自己生活的無意義而深感痛苦。他們既不滿於現實，又無力去改變現實，既不願與貴族統治集團同流合污，卻又不能與貴族社會的生活環境徹底決裂，更無法掙脫貴族階級的種種偏見的束縛，於是陷入矛盾、痛苦之中。於是，他們只能在內心的自省中生活，或者說，生活在自己的內心世界中。²⁴十九世紀二十至五十年代，這類典型的貴族知識分子在當時作家筆下，即稱之為“多餘人”（лишний человек）²⁵。然而，對於俄羅斯貴族知識份子“多餘人”這種令人困惑的現象，作家高爾基曾在《俄國文學史》一書中肯地說道：「假如注意到當時的一切條件：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智慧貧乏，以及農民大眾沒有認識自己的任務，我們應該承認，在那個時代，理想家羅亭²⁶比實行家和行動者是更有用處的人物。一個理想家是革命思想的宣傳者、是現實的批判者、是所謂開拓處女地的人；可是，在那個時代，一個實踐家能夠做出什麼來呢？」²⁷高爾基話語中，著實將俄羅斯貴族知識份子“多餘人”的負面形象予以消除，同時贊同他們思想上的卓越貢獻。

十九世紀前半期的俄羅斯貴族知識分子同時受到上層沙皇專制國家的排擠和下層廣大農民的無法諒解，他們找尋不到自我存在的價值，或者是說俄羅斯的社會容不下知識分子這樣具有批判思想、反專制的角色。赫爾岑對此表示：「存

²⁴ 魏玲，論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形象，國外文學，北京，1994年第四期，頁57。

²⁵ “多餘人”是19世紀俄國文學中貴族知識份子的一種典型，此一詞首見於屠格涅夫的小說《多餘人日記》（«Дневник лишнего человека»）中。俄羅斯多餘人的特點是出身貴族，生活在優裕的環境中，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他們雖有高尚的理想，却遠離人民；雖不滿現實，却缺少行動，只能在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費自己的才華；他們既不願站在政府的一邊，與上流社會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對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在專制社會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而顯的孤獨、多餘。

²⁶ 羅亭（Рудин），屠格涅夫同名小說中多餘人的典型。

²⁷ 孫乃修，屠格涅夫傳，台北，業強出版社，1992年，頁128。

在著上層受教育階層與廣大下層務農人民之間強烈的疏離感，疏離並非僅是一種隔離，也不只是智力或生活經驗的差異，而是每天的日常生活，甚至是精神心靈的反應。」²⁸徘徊在國家與人民之間，貴族知識份子無從選擇自己的立身之處，而“平民知識份子”的產生，似乎為貴族知識份子身份上之矛盾，解開了一項難題。

四、十九世紀後半期俄羅斯平民知識份子

十九世紀五十到六十年代的俄國，一切社會問題可以說是農奴制度和沙皇專制下引發的社會矛盾，在克里米亞戰爭（Крымская война, 1853-1856）中挫敗的俄羅斯，必須要有所改革。改革若非由政府主動地順應潮流，施行社會革新方案以保護沙皇政權的存在，則由民眾透過革命的方式打倒專制、推翻沙皇政權。圍繞著對俄羅斯改革的態度，俄國出現了兩種改革力量：主要以齊采林（Б.Н. Чичерин, 1828-1904）為代表的溫和自由派以及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代表的激進革命民主派。自由派不能容忍農奴制度，可是又害怕革命，害怕推翻君主制度和消滅地主權力的群眾運動，他們希望透過“由上而下”的方式逐漸解放俄羅斯，但是這一條思想脈絡並未成為俄國歷史發展的主流。尤其從 1861 年農奴解放政策施行後，俄羅斯農民的生活並沒有獲得相當的改善，再加上種種不公平的現象產生，導致農民暴動事件不斷，這樣動亂的社會情況，逐步將革命民主主義之發展推向高峰。1861 年改革後俄羅斯社會的矛盾，使知識份子對現存一切制度感到失望，農奴解放政策並沒有解決廣大農民的經濟困難，再加上政府強烈拒絕政治改革，使得具有批判能力的知識份子必須重新對傳統的社會價值進行廣泛的評估。俄羅斯激進革命知識份子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由“平民知識份子”作為主要代表。關於俄羅斯平民知識份子之崛起，則是受到十九世紀後半期農奴解放、俄羅斯教育逐漸普及、俄羅斯工業發展、資本主義興盛以及貴族階層逐漸瓦解等原

²⁸ Nicholas Riasanovsky, *A Parting of the Ways: Government and the Educated Public in Russia, 1801-185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p. 27.

因，使原本穩固的傳統社會階層與舊價值觀開始鬆動。

由於俄羅斯的西化政策主要觸及社會上階層，只有貴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機會，因而俄羅斯第一批知識份子出身於貴族階層。當時每個省只有一所中學，半數以上的縣城連小學都沒有，教育基本上是貴族子弟才能享有的權力。凱薩林大帝就曾公然聲稱：「庶民無須受教育，否則他們就不會順從。」²⁹俄羅斯從亞歷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а I, 1777-1825）的教育改革過程中，已經逐漸擴大受教育者，尤其進入亞歷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а II, 1818-1881）大改革的時代，更是推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1863 年政府頒布新的大學規定法，廢除大學自治的禁令，允許大學生集會結社、出版刊物，非貴族子弟甚至是女生亦獲准入學。1864 年的地方自治（земство）改革，也使鄉村地區有機會大量興建中學，另外政府也頒布國民教育法（1864），規定只要通過入學考試，任何人皆可入學，教育的普及已經逐漸在俄羅斯蔓延。³⁰

表 2-1 為 1833-1885 俄羅斯的中等教育學生之社會組成百分比，從中可以明顯觀察到，在 1861 年農奴解放之後的每隔十年，社會低下階層人民接受中等教育之百分比隨之提高百分之十左右。而其中約有八至九成的學生會繼續在大學或其他專科學校就讀³¹，整體學生組成份子更為平民化。

表 2-1 1833-1885 年俄羅斯中等教育學生之社會組成百分比

年份	貴族階層	教士階層	賦稅階層
1833	78.9	2.1	19.0
1843	78.7	1.7	19.6
1853	79.7	2.3	18.0
1863	72.3	2.8	24.9
1874	57.7	5.5	35.7
1885	49.1	5.0	43.8

²⁹ 邵麗英，俄國貴族、知識份子及其他，

<http://intellectual.members.easyspace.com/academic/china%20russia%20intellectual.htm>。

³⁰ Nicholas Riasano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rd ed., 1977, p. 485.

³¹ 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6, p. 262.

然而，除了教育普及促使俄羅斯低下階層知識社會之開展，1862 年社會改革以後上層貴族地位之瓦解更是俄羅斯“平民知識份子”出現之重要影響因素。改革後的俄羅斯社會結構產生相當大的變動，尤其在貴族階級當中出現了分化，除了在軍隊服役或擔任公職之外，越來越多的貴族成為資產階級的地主或企業家，而也有部分家道中落者成為徒有貴族之名的無產者。貴族的階級特權不再是絕對，甚至在文官的補充和升遷上所享有的特權都受到削弱，致使低等官階之貴族生活飽受威脅。³²綜合上述的社會發展現象，俄羅斯社會出現了“平民知識份子”（разночинец），這些人主要來自低層官階中窮困之沒落貴族、商人、小市民、神職人員以及農民階級中受過教育者³³。平民知識份子代表著腐壞舊制度與新社會之間的聯繫者，尤其是農奴制度解放之後，舊有的階層制度不再適用於新的社會環境。

另外，別爾嘉耶夫認為平民知識分子的組成主要是教士的子弟或神學院的學生，在解放的時代中，他們興起對教會腐敗之抗議，同時他們的生活環境比起貴族而言，更加的嚴厲和痛苦，因而對廣大農民的苦難更能夠感同身受³⁴。這些曾經接受過東正教神學啟發的學生，卻狂熱地接受唯物論與無神論之思想模式，其中的邏輯看似矛盾，卻又強烈地表現出俄羅斯知識份子的宗教氣質。倘若知識份子反對宗教，那麼他所排斥的並非是精神上的“信仰”，而是反對實體上陳腐的東正教會，尤其革命對於激進知識份子而言，是要締造一個理想完美的社會，所以革命被視為聖潔的行為，其中充滿了耶穌救世論（soteriological）與天啟³⁵。但還是必須客觀地說，事實上，平民知識份子當中為神職人員者佔相當少數，不過他們卻在革命志業當中發揮無比的影響力。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這兩

³² 姚海，*俄羅斯文化之路*，台北，淑馨出版社，1991，頁 167。

³³ Alan Kimball, *Who Were the Petrashevtsy?* <http://darkwing.uoregon.edu/~kimball/Petrashevtsy.htm>.

³⁴ 鄭學稼譯，*俄羅斯共產主義之本源*，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1975 年，頁 55。

³⁵ Gary Morson, *What is the intelligentsia? Once more, and old Russian question*, *Academic Questions*, 2004, Vol. 6, Issue 3, p. 50.

位激進主義者，正是教士階級出身的平民知識分子的主要代表。對於俄羅斯現狀的改變，車爾尼雪夫斯基宣傳農民革命的思想，主張採取推翻一切舊權力的群眾鬥爭。他曾讚揚到：「對亞歷山大二世的祝福是歐洲任何一個君主所沒有受到過的，因為對他來說最大的幸福就是著手解放自己的臣民。」³⁶但是當他意識到政府的解放並不完善，便開始否定自上而下的改革。他認為，不可能指望上層貴族剝削者與統治者為下層被壓迫的農民謀幸福，自由主義者需要的只是共和國、憲政之名，而非真正要將下階層的農民從奴役與物質匱乏的狀態下解放出來。車爾尼雪夫斯基相信俄羅斯必須也必然會爆發革命，他曾說道：「人民對政府、賦稅、官吏與地主的不滿情緒與日遽增，只消有星星之火就可以使一切燃燒起來。同時，受過教育的人們中間，敵視現存制度的人數也正在增加，將要燃起這場大火火種已經準備好了。問題只在於：要到什麼時候才會爆發，也許要再過十年，但我想恐怕不需要…我將要去參加，我將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³⁷杜勃羅留波夫是車爾尼雪夫斯基革命民主主義哲學的闡述者及補充者，他也指出：現在，從事社會活動的時代已經來到了，或者說，立刻就要來到了³⁸。不同於車爾尼雪夫斯基與杜勃羅留波夫的神職人員家庭出身，革命民主主義者彼薩列夫出身於貴族，他把革命民主主義的知識份子稱為“有思想的現實主義者”（Мыслящий реалист），彼薩列夫認為知識必須與勞動結合，知識份子必須為群眾服務，把知識傳授給那些一定能從這裡面得到實際利益的人，知識份子必須直接或間接地從事有助於重建新世界的工作。“有思想的現實主義者”與 40 年代貴族知識份子所代表的“多餘人”具有截然不同的自我角色定位，他們仇視與行動無關又不肯實踐的所有崇高理想。³⁹“1870 年代，革命知識份子承襲著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觀點發起之民粹主義運動（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⁴⁰“到民間去”（хождение в народ）

³⁶ 姚海，俄羅斯文化之路，台北，淑馨出版社，1991，頁 165。

³⁷ 苗力田，十九世紀俄國革命主義者的哲學和社會政治觀點，中國青年出版社，頁 74。

³⁸ 魏玲，論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形象，國外文學，北京，1994 年第四期，頁 63。

³⁹ 苗力田，十九世紀俄國革命主義者的哲學和社會政治觀點，中國青年出版社，頁 109。

⁴⁰ 別爾嘉耶夫認為“民粹主義”是俄羅斯的特殊現象，其有多種表現，有保守的、革命的、唯物主義的和宗教的民粹主義。在革命政治行動上，十九世紀六十、七十年代的民粹主義思想流

⁴¹，正是以行動力號召廣大農民透過“由下而上”的方式共同進行革命推翻沙皇專制。但是正如同貴族知識分子一般，儘管平民知識分子的身分不再是為國家服務的貴族階級，但是他們仍然無法逾越與農民之間的隔閡。對於農民而言，東正教根深地固的信仰觀念，使他們視對沙皇的不敬是一種褻瀆神聖的行為。對於“到民間去”運動的失敗，民意黨⁴²（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成員吉霍米洛夫⁴³（Л. А. Тихомиров, 1852-1923）後來這樣寫到：

民粹派份子找到了群眾，這些群眾是剛被沙皇解放了的群眾，是擁有了土地並團結到村社的群眾，這些群眾明白，他們的村社是二位一體的沙皇統治者與保護者之最大的政治組織力量。但這些農民甚至比“地主”更不願否認沙皇的“公僕”職能。農民虔誠地信仰上帝，在很大程度上是幻想家，其最高的嚮往不是日常生活的舒適，而是到某個地方去當一個不可理解的、神聖的、稱職的傳道者。農民是集體思想的根源，他們在遇到了那些向其指示“應往何處去”的“精神失常者”便很不客氣，而知識份子直到這

派主要可以分為以拉甫羅夫（П. Л. Лавров, 1823-1900）為代表的“宣傳派”（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以巴庫寧（М. А. Бакунин, 1814-1876）為代表的“無政府暴動派”（анархистско-бунтар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以特卡喬夫（П. Н. Ткачев, 1844-1885）為代表的“布朗基派”（бланкистско-заговорщиц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以及以涅恰耶夫（С. Г. Нечаев, 1847-1882）為代表的“恐怖暗殺派”（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等。他們在民粹主義思想原則上同樣崇尚、信仰人民，企圖以俄羅斯農村公社之理想機制繞過資本主義，帶領俄羅斯直接通往社會主義。其思想分歧點在於，拉甫羅夫強調透過宣傳、教育人民，待一切準備完善再進行革命，而非以突然的手段推翻政府；巴枯寧則認為當務之急便是快速的發動人民革命；特卡喬夫與涅恰耶夫則視激進的恐怖主義方式，是俄羅斯道德精神與社會復興的唯一手段。

⁴¹ 1874年，大約有二、三千名革命青年拋棄原本城市的生活與工作、穿上農民的服裝，到鄉間作醫生、醫生助手、小學教師、鄉村書吏，甚或作農工、鐵匠、樵夫等。他們力求在那裡和農民密切地接觸，幫助鄉村的人民。他們以高度的熱情向農民進行鼓吹宣傳，鼓動農民群起進行社會革命。但結果卻是農民們將這些大學生送交警察，有些人甚至因此而被流放至西伯利亞等偏區。

⁴²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羅斯民粹派秘密團體，主張用恐怖手段推翻沙皇政權。

⁴³ 吉霍米洛夫（Л. А. Тихомиров, 1852-1923）為特卡喬夫的主要追隨者，亦為民意黨思想的主要發言人。

時竟然還一點都不瞭解這個人民階層。⁴⁴

列寧(В.И. Ленин, 1870-1924)曾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這樣評價民粹派的活動：「…“到民間去”吸引了他們，為了人民他們曾經受苦，坐牢，被流放。他們用革命的思想鼓舞了人民，對人民的需要和利益都各有自己的理解。他們一直讚揚群眾的高貴精神品質。簡單說來，一部分知識份子把人民看作自己的神靈…。」⁴⁵民粹主義者把俄羅斯村社制度理想化，更把俄羅斯“人民”理想化，關於後者這一點，是我們在探討十九世紀後半期俄羅斯知識份子之自我身份認同時相當關鍵性的因素。不只是激進主義者將俄羅斯人民當作崇敬之對象，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說《煙》(«Дым»)中提到：「而我們這些人，有文化的人，只是些萎靡之人。而人民，噢！人民是偉大的。」⁴⁶杜斯妥也夫斯基於1876年2月在他的《作家日記》(«Дневник писателя»)中自問：「人民和他們之間誰更有價值？是希望農民學習我們的模樣，還是我們學習他？我誠實地說：“我們應當向他們鞠躬，請教觀點和形式，承認和欣賞他的真理！”」⁴⁷儘管“人民”(народ)是一個抽象名詞，更不單指任何一個階層之人，甚至“人民”可以代表整個民族，但是在俄羅斯歷史當中，人民則是具體的指稱這些佔了帝國人口絕大多數，且遭受不合理生活對待之農民階層。俄羅斯的農民最早依附在土地上，他們幾乎毫無人身自由，又必須賦稅與擔負沈重的勞役，獲得解放後，其生活並未因此而改善，因而俄羅斯歷史上屢次出現的動亂皆以提倡解放“人民”、為“人民”謀求幸福為名。然而俄羅斯“人民”存在於沙皇專制政府之下，除了是一群以務農為主、沒有人身自由、缺乏知識教育之群眾之外，更是西化前俄羅斯精神價值之保存者。與俄羅斯西化運動隔絕之俄羅斯農民，在心理層面與生活形態上保有俄羅斯國家最根本之特質。從心理層面來看，俄羅斯國家建立在毫無遮蔽的遼闊土地

⁴⁴ 曹維安，俄國史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348。

⁴⁵ 林子明，民粹誤解何其多，<http://www.housebook.com.cn/200406/09.htm>。

⁴⁶ 劉增泉，帝俄和俄羅斯，國立編譯館，2000年，頁333。

⁴⁷ 同上。

上因而屢次遭受外敵入侵，再加上於嚴峻的氣候條件下耕植不易等因素，造就了俄羅斯人民追求集體安全之心態，他們安於現狀、害怕在求新變更下將威脅到現存脆弱之生存平衡⁴⁸。再者，在農民傳統的信仰觀念當中，上帝所創造的世界本是充滿危險與艱苦，以此來考驗人們對神聖旨意的服從，不管是反對上帝或是上帝在世間的代理人，必將遭受天譴⁴⁹。從宗教信仰更可以察覺，傳統信念在農民世界的保存。1453 年東正教的重鎮君士坦丁堡淪陷以後，俄國人認為莫斯科是“第三羅馬”，正式成為東正教的中心，而不會再有“第四羅馬”出現，斯拉夫民族是上帝的選民，他們身負拯救世界之任務。因而堅決反對尼康（Никон, 1605-1681）宗教改革的“舊信仰者”大多是農民，他們拒絕接受任何正統之改變。即便彼得的西化過程帶來無數創新，但是涉及面卻鮮少觸及到農民生活，傳統的價值觀與心理層面的不穩定性與不安全感狀態持續保持在俄羅斯人民性格與世界觀當中，直到農奴制度解放後，他們才開始要學習適應整個國家社會的變動。由上述可知，俄羅斯固有之宗教理念與文化意識，在彼得大帝西化與宗教改革之下逐漸喪失，但卻幾乎完整保存在人民日常生活及其世界觀當中。這更清楚地解釋了不管是 1825 年的十二月黨人起義或者是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到民間去”運動，俄羅斯知識份子孤寂地承受失敗。原來，知識份子與人民之間的隔閡不僅存在於社會階層與教育文化之間的差異，還包括他們對世界觀體認的不同，俄羅斯宗教傳統根深蒂固的埋布於廣大人民信仰當中，使知識份子的叛亂行為注定得不到人民熱情的擁抱。在 1870 年代的“到民間去”運動失敗後，主張恐怖行動之革命知識份子組織“民意黨”（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前後八次採取對沙皇的暗殺行動，並於 1881 年將亞歷山大二世炸死。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革命情勢高漲，社會籠罩在恐怖暴動氣氛之下，此時俄羅斯宗教哲學唯心主義逐漸復甦，文學思想家以宗教道德良知為出發點力挽狂瀾地大聲吶喊呼籲激進改革者，他們與廣大人民之精神世界已背道而馳，同時他們的行動更背離知識份子本身救

⁴⁸ Marc Raeff, *The People, the Intelligentsia and 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Studies, 1993, p. 94.

⁴⁹ Ibid.

贖人民的最初崇高理想，倘若革命繼續發展將招致俄羅斯的毀滅。因而在俄羅斯哲學思想界，產生了對激進革命知識份子過度重視唯物史觀，而忽略俄羅斯固有精神道德之意識提出質疑與批評。

五、十九世紀後半期文化思想界對俄羅斯知識份子的道德良知質疑

1840 年代，俄羅斯斯拉夫派的主張隨著提倡者的相繼去世而逐漸沉寂，但是就在克里米亞戰後，當各種改革主張一一浮現之時，類似斯拉夫派，象徵著崇尚俄羅斯精神的主張也正在甦醒。國家保守主義者們害怕資本主義的入侵、害怕工業化的過程將導致人性的喪失，他們同樣身負社會理想的義務，但是不同於同時期的激進革命知識分子，國家保守主義者堅決反對激進的改革手段，而是推崇以謹慎的、有耐心的漸進改變方式，雖然這可能會花費十年或甚至是整個世代的時間。當激進革命主義運動如火如荼地繼續進行著，俄羅斯思想界上，一場內心道德使命奮戰，也正在燃起，就像是十九世紀前半期西化派與斯拉夫派的論戰再次掀起。

《路標》集的作者之一斯特魯威（П. Б. Струве, 1870-1940）在他的作品《知識份子與革命》（«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當中說道：「我們的民族文學領域是知識份子無法佔據的領域。偉大的作家普希金（А.С. Пушкин, 1799-1837）、萊蒙托夫（М.Ю. Лермонтов, 1814-1841）、果戈里（Н.В. Гоголь, 1809-1852）、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0）和契訶夫（А.П. Чехов, 1860-1904）都不具有知識份子的面貌。」⁵⁰車爾尼雪夫斯基認同普希金作品中崇高的民族精神，但是在論及普希金的文學創作目的時，車爾尼雪夫斯基說道：「無用處之東西不具有存在之權利」⁵¹。同樣的，彼薩列夫稱普希金為“崇高的白痴”⁵²，因為普希金沒有為鼓吹革命而行動。的確，這些偉大的

⁵⁰ 彭飏、曾予平譯，路標，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47。

⁵¹ Кривошеев М.В., Кривошеев Ю.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1861-1894, СПб.: Гатчина, 2000, с. 58.

⁵² Там же.

俄羅斯作家如同斯拉夫派的許多擁護者般，從來就不是社會改革的行動家或革命家，而是國家發展的思想家與哲學家，倘若以“必須具備革命行動”的條件來審視俄羅斯“知識份子”的定義，他們勢必不合格。他們反映在作品中的哲學思想不同於革命民主觀點之思想，而是流露出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其與俄羅斯東正教精神內涵相互呼應。尤其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當中更是直接以宗教作為議題，反覆論證宗教道德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衝突。1880年6月8日，杜斯妥也夫斯基在莫斯科舉行的慶祝普希金紀念像落成大會中發表了一篇演說，他將普希金的創作活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長詩《吉普賽人》（《Цыганы》）的主人翁阿列闊（Алеко）的形象揭露了俄羅斯無家可歸的漂泊者，這樣的人剛好出生於彼得大帝改革百年之後，出生在這個知識份子脫離民眾和大眾力量的社會裡⁵³。第二個階段的普希金已在本國大地上找到了自己的理想，透過作品《尤金·奧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所塑造的一系列美好形象的人，在其中表現出普希金相信俄羅斯性格、相信其精神力量⁵⁴。第三個階段則是體現全世界思想，融合了俄羅斯傳統，同時能夠完完全全地再現其他國家的民族性、敏銳地抓住每個國家的根本特點⁵⁵。

杜斯妥也夫斯基在演說當中談到普希金的“普世同情心”（всемирная отзывчивость），這樣的博愛是俄羅斯文化精神的象徵，普希金並非在任何的歐洲思想當中，而是在俄羅斯民族當中理解到這樣崇高的美善。杜斯妥也夫斯基以此呼籲，停止對社會的不公正訴諸於毫無意義的革命手段；呼籲知識份子將精力集中在全世界人類的聯合，同時他更加強調，通向和諧與臻善的社會必須透過順從與苦難，這些磨練將會幫助人們克服道德的危機，杜斯妥也夫斯基深信唯有和諧，社會才會正常地向前運行。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諸多理念在當時刊登於著名的雜誌《時間》（《Время》），

⁵³ 杜斯妥也夫斯基，俄羅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18。

⁵⁴ 同上，頁123。

⁵⁵ 同上，頁124。

1861-1863) 與《時代》(«Эпоха», 1864-1865) 中。與他持相同理念的人還包括文學批評者格里高爾耶夫 (А.А. Григорьев)、與社會評論家斯特拉霍夫 (Н.Н. Страхов), 他們以“俄羅斯土壤派”(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 作家的身份提出對於國家發展之精闢見解。俄羅斯土壤派是 19 世紀 60 年代產生出來的哲學浪漫主義流派, 他們哀悼俄羅斯知識份子疏遠於自己所處的社會、毫無根根的漂流、缺乏內在的心裡平衡以及道德感之無所依據, 他們不斷在找尋銜接知識份子與廣大群眾之間的互通橋樑⁵⁶。土壤派主義者並不反對改革, 甚至贊同彼得大帝的西化政策, 他們認為進步與創新總比停滯與沈睡好, 然而透過革命方式來改變現狀是他們所無法忍受的。革命所造成的後果, 必然比他所建立的更不容於道, 而既然必須透過激進的革命方式推翻一切, 則代表這樣的改變並非真正順應整個社會期盼, 根據土壤派的觀點, 整個社會制度的改革會由它內部自行衍生出一股力量來產生轉變。他們認為“民族的土壤”(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чва) 是俄羅斯社會精神發展的基礎, 即必須用宗教的精神來解釋人民的理想, 並希望用道德上的感化來代替反對專制制度的政治鬥爭, 希望求得統治階級和人民之間的和解。土壤派以俄羅斯“靈魂”(душа) 取代斯拉夫派所崇尚的俄羅斯“精神”(дух), 土壤派主義者認為, “靈魂”是一種無法以言詞直接表達的意念, 它深植於人民生活無意識當中。而在人民的信仰、傳統歌謠、故事、風俗習慣等當中, 具體呈現出俄羅斯的內在靈魂, 因其而具有成為國家根基之實質意義。⁵⁷針對革命民主主義的觀點, 杜斯妥也夫斯基指責激進的知識分子脫離人民的“根基”與俄羅斯的“靈魂”, 解決俄羅斯的社會對立與矛盾, 不能像西歐那樣採用鬥爭和革命的方式, 而必須透過知識份子與人民的調和, 使俄羅斯社會之分歧完成統一。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思想奠基於土壤派, 但是在他作品中所呈現的觀點, 卻更常是超黨派、超民族與永恆的人性思想論述。

正如同杜斯妥也夫斯基意識到, 在複雜多變的人性面前, 社會制度的變遷只

⁵⁶ Offord Derek,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opposition to autocracy, New York: Longman, p. 49.

⁵⁷ Wayne Dowler, Dostoevsky, Grigorev, and Native Soil conservatism,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2, p. 78.

是一種外在形式的變化，它可能會改變人們的生活觀念，卻無法觸及人類的靈魂。將人類的罪惡歸因於社會環境與制度，就有可能產生一部份的人，他們以遭受社會制度壓迫為藉口，或者以為社會除惡建立新世界為理由，而犯下更大的罪惡。⁵⁸文學家托爾斯泰（Л.Н. Толстой, 1828-1910）也深信，並非是外在制度的改變，而只有個人內在道德良心的改善，才能導致社會實質的進步。⁵⁹尤其在1880年之後，他透過作品勸告人們放棄邪惡之念頭從而過更好的生活。所謂的“托爾斯泰主義”提出拯救俄國和人類的政治道德主張，其基本內容便是“不以暴力抗惡”、“道德自我完善”和“全人類的愛”。但是，托爾斯泰對知識份子的角色判斷，則是認為大多數高階層的文化與知識都是在追求一種不道德也不必要的奢侈，甚至物質文明所創造的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足以破壞人類的自然良知，他嚮往俄羅斯農民簡單樸實與自然結合的生活。

而與土壤派作家或托爾斯泰的觀點相較，契訶夫對於十九世紀後半期俄羅斯知識份子的角色定位，似乎又有一套獨特的詮釋觀點。契訶夫不具有任何政治意識色彩，他甚至公開譴責任何“黨派偏見”支配著當時的社會情況。1888年10月4日，在契訶夫寫給詩人普列謝耶夫（А.Н. Плещеев, 1825-1893）的信中提到：「我害怕那些想要在我作品中找出某種觀念的人、畏懼那些探究我是自由或是保守主義者之人。我並非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漸進主義者、僧侶或者是無主義者，我不過想成為一個自由的作家，而我遺憾上帝並沒有將此能力賦予我。我憎恨任何方式之虛偽與強迫…。我的宗教信仰是人類本身、健康、智慧、天賦、靈感、愛以及絕對的自由，完全自由地脫離以暴力與謊言建構而成之任何形式。如果我是一個偉大的作家，這便是我立足之根據。」⁶⁰契訶夫堅決反對在作品當中企圖宣揚任何一種政治主張，在政治社會意識混亂之時，契訶夫拒絕將自己定位在任何政治、宗教或哲學派系之內。契訶夫用他深刻的觀察在作品中描寫當時

⁵⁸ 金雅娜等，充盈的虛無-俄羅斯文學中的宗教意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66。

⁵⁹ Offord Derek,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opposition to autocracy, New York: Longman, 1999, p. 87.

⁶⁰ Anton Pavlovich Chekhov, <http://www.eldritchpress.org/ac/chekhov.html>.

俄國社會的各個階層：農民、教員、醫生、軍人、商人、地主、小官吏…，用他精鍊的文筆肯定了一切平凡和普通的人，一切勞動者和創造者所應有的享受幸福的權利。就如他自己的箴言：「為公眾福利服務的願望，應該成為心靈的需要和個人幸福的條件。」⁶¹ 如果說托爾斯泰厭惡知識文化，那麼契訶夫則認為知識份子正是俄羅斯未來的主要希望。儘管契訶夫曾在 1899 年的一封信中寫到：「我對我們之中的許多知識份子沒有信心，他們虛偽做作、懶惰、不肯謙虛的充實自己。」⁶²但是他對於俄羅斯知識份子的積極角色仍是深具信心的，契訶夫在《札記》（«Записные книжки»）裡有一句話，最能表現出他對知識份子角色的正面看法，他說：「一個國家的力量與希望全要靠知識份子，靠他們誠實的思考與努力的工作。」⁶³契訶夫對於俄羅斯知識份子的評判，不以他們的階級、革命行動力或宗教信仰為標準，而是知識份子的公民道德感。身為知識份子必須擁有自我修養，且將之表現在生活的每一個環節上、尊重每個社會階級的人、對於敵對者之論點予以公正之評述以及對於他們所宣傳之理念身體力行。⁶⁴

繼契訶夫之後，名為《路標》的論文集提出俄羅斯知識份子對於精神道德意念復甦之社會責任，同時批評激進革命知識份子的傲慢與自大，徹底違反東正教信仰教義中無政治意識之謙遜理念⁶⁵。這本論文集發行於 1909 年，在文學家赫爾森尊（М. О. Гершензон, 1869-1925）號召下，由別爾嘉耶夫（Н. А. Бердяев, 1874-1948）、布爾加科夫（С. Н. Булгаков, 1871-1944）、伊茲戈耶夫（А. С. Изгоев, 1872-1935）、基斯恰可夫斯基（Б. А. Кистяковский, 1868-1920）、斯特魯威（П. Б. Струве, 1870-1940）與弗蘭克（С. Л. Франк, 1877-1950）七人執筆而成。此七人對於俄羅斯知識份子之批評探討，所提出的理念並非全然一致，然而將他們納

⁶¹ 契訶夫，俄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巨匠，
<http://news.163.com/05/0128/11/1B68QC4600011246.html>.

⁶² 范文，契訶夫傳，志文出版社，1976 年，頁 162。

⁶³ 同上，頁 163。

⁶⁴ Dmitri Shalin, *Russian culture at the crossroads: paradoxes of postcommunist consciousness*, Westview Press, p. 60.

⁶⁵ Emerson Caryl,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and post-soviet religious thought*, *Cross Currents*, 1993, Vol. 43, Issue 2, p. 50.

入同一個陣營的最大共同點，便是對左翼激進革命知識份子之批評，他們認為所謂革命知識份子僅是一群狹隘的實證主義家，其不重視精神價值且脫離宗教是造成社會混亂與不安定之主因。

我們可以在《路標》集當中觀察到“路標派作家”對於革命知識份子所提出的非難。布爾加科夫認為俄羅斯知識份子將對宗教之景仰，轉移至對人民的崇拜，並將此稱之為“精神的盲從”。知識份子為“人民”奉獻，他們隨時準備犧牲自身利益、科學與藝術興趣、甚至是生命。而正是這樣的自我犧牲、煎熬與痛苦，產生獨一無二的“英雄主義”（героизм）⁶⁶。布爾加科夫在《路標》集《英雄主義與苦修》（«Героизм и подвижничество»）一文中提到：「俄羅斯知識份子在磨難的環境中成長壯大，因此在知識份子神聖的苦難面前，我們不能不懷著崇拜的心情。…然而這種崇拜並不能使我們對始終作為真理之事務保持沈默。⁶⁷

“自我崇拜”（самообожание）是俄羅斯知識份子最大的缺點，他視自己為人民的救星，甚至是全人類的救星。對他而言，他所需要的（當然是在幻想中）並非已經保證的最低限度，而是英雄的極限。⁶⁸」而別爾加耶夫也在論文當中批評知識份子“愛人民”幾近“人民崇拜”之地步，對真理之愛已麻痺，他們所關心的不是真理本身合適不合適，而是真理對社會主義反專制政府有沒有用⁶⁹。赫爾森尊也一再強調只有深深紮根於人民的文化傳統才能有創造，而當時的知識份子過渡自我膨脹，陷入了創造精神枯竭的危機；伊茲戈耶夫認為受上一代知識份子薰陶教養的青年本來應該是未來革命的預備軍，但他們在道德上是墮落的一代，在知識上是停滯的一代，如不從本質上加以改造，根本無法擔當創造文化之大任；而斯特魯威則批判知識份子漠視宗教的態度，認為今天的知識份子只是哥薩克叛亂精神的繼承與發揮。⁷⁰

⁶⁶ P.P. Gaidenko, Landmarks, Russian Social Science Review, Sep/Oct93, Vol. 34, Issue 5, p. 49.

⁶⁷ 彭甌、曾予平譯，路標，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4。

⁶⁸ 同上，頁36。

⁶⁹ 王兆徽，《路標》集在俄國文化史上的意義，俄語學報，國立政治大學俄國語文學系，1998，創刊號，頁191。

⁷⁰ 同上，頁192。

從十九世紀後半期俄羅斯歷史的發展中得知，雖然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掌握在激進革命知識份子手裡，但是訴諸於道德良知追求的理念，卻不曾被激進革命的洪流所掩蓋。當社會中不安的因子存在愈多，主張精神革命的思想力量愈能茁壯。尤其在十九世紀末年，當俄羅斯的解放運動已逐漸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新階段，俄羅斯諸多思想哲學家仍不斷訴諸透過個人道德與人性之善美作為俄羅斯改革的基礎，他們追求的是先完善個人內心，並達到個人的自由，他們極力呼籲若俄國走革命的道路將招致毀滅。關於十九世紀後半期俄羅斯社會發展的前進動力，存在著兩股勢力：其一是堅信以暴力的革命手段來完成臻善的社會，其二則是回到俄羅斯的傳統精神，先透過個人內心世界的完善，才能達到最終的理想境界。但是殊途同歸，兩者的角色都是從對俄羅斯人民的同情出發、對殘酷社會提出控訴，並秉持著內心虔誠的信仰來救贖俄羅斯。

立意上，不論是透過革命手段或是訴諸於精神道德之完善，都呈現出十九後半期俄羅斯知識社會界瀰漫著一股強烈的愛國使命感。這樣的情懷表現在政治上是激進主義與俄羅斯宗教精神思維之對立；而反映在繪畫藝術上，則是「巡迴展覽畫派」藝術家以其批判現實主義風格輔以各種題材發揮，充分體現藝術家對當時社會發展之感觸，當中整個十九世紀後半期社會思維發展的脈絡亦反映其中。

第二節 俄羅斯「巡迴展覽畫派」之創作特色與民間創作題材之運用

一、俄羅斯繪畫批判現實主義

十九世紀三十、四十年代是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歐國家快速發展的時期。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和鞏固，使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和各種社會弊病日益顯露和激化，在馬克斯與恩格斯的《共黨主義宣言》中便提到：「資本主義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面對這種冷酷的社會現實，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⁷¹此外，辯證法、唯物論和自然科學的新成就，使藝術的主流轉向真實地表現生活和再現社會風貌、揭示社會矛盾的現實主義。這股強勁有力的藝術潮流，由於它對現存秩序的揭露和批判，人們稱之為批判現實主義。⁷²由於俄羅斯的資本主義發展腳步較晚，因而批判現實主義風潮在俄羅斯之發展遂成為當時沙皇專制下，對農奴制及其他社會不公之現象提出控訴。例如涅克拉索夫（Н.А. Некрасов, 1821-1877）在《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ь хорошо》，1866-1876）中描寫人民的痛苦與不幸；筆名為謝德林的薩第可夫（М.Е. Салтыков-Шедрин, 1826-1889）描寫上層貴族心靈腐朽之作品《戈羅弗列夫老爺們》（《Господа Головлевы》，1875）以及杜斯妥也夫斯基描寫城市貧民悲慘命運的作品《窮人》（《Бедные люди》，1846）《罪與罰》（《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1866）等；儘管激進革命知識份子車爾尼雪夫斯基，並非專門研究藝術美學問題，但是他在論文《藝術與現實的美學關係》（《Эстетическ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искусства к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1855）中明確提出了批判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在理論上為蓬勃興起的文藝運動給予有力的指導。車爾尼雪夫斯基從唯物論與革命理論的觀點出發，賦予藝術創作新的闡釋。他認為藝術創作的最

⁷¹ 歐洲文學史-現實主義，<http://www.oh100.com/art/wenxue/history/index.html>

⁷² 俄國藝術，<http://www.letart.com/xfds/0109/home.htm>.

高目的應該是為人民服務，描繪俄羅斯民眾的生活、歷史和人的勞動美，表現出民眾要求解放的願望，並批判專制政治和農奴制之腐敗。⁷³在論文當中，車爾尼雪夫斯基提出了對藝術創作精闢的定義，他認為“美是生活”、藝術的作用還包括“再現生活”、“說明生活”以及“對生活做判斷”。美的真正最高境界，正是人在現實世界中所遇到的美，而不是藝術所創造的美，抽象的思想並不包含在生活領域之內，我們只能在現實、活生生的事物當中看見生活，而這就是藝術與美的呈現。⁷⁴因而對於真正藝術的表現，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藝術家只要去體驗認識生活並將它表現出來，這樣的藝術創作與現實關係之理念，在俄羅斯藝術界引起熱烈之討論與迴響。除了在文學界中的現實主義表現，在音樂創作上，1862年出現了承襲俄羅斯國民樂派始祖格令卡（М.И. Глинка, 1804-1857）創作理念而成立的「強力集團」（Могучая кучка）⁷⁵，他們明確反對上流社會對義大利和法國音樂的盲目崇拜，同時認同民主主義的觀點，認為藝術應與人民群眾保持關連，其拋棄以往華麗嚴謹之音調，力求透過音符之律動表現俄羅斯固有民族性、地方性色彩；他們從俄國歷史、人民生活、文學著作和民間音樂中去尋找創作素材，其旋律大量採用俄羅斯民謠、節奏奔放，同時深富戲劇性與寫實性。而俄羅斯繪畫界的現實主義表現風格更早在十九世紀初期，在帶有浪漫色彩的皇家美術學院繪畫中露出端倪，並在費托多夫（П.А. Федотов, 1815-1852）的作品中綻放光芒。史塔索夫（В.В. Стасов, 1824-1906）曾說：「費托多夫是精湛豐富俄羅斯藝術中的一顆種子，其純淨之珍貴角色為之後的藝術界帶來偉大輝煌之果實。」⁷⁶這一顆驕傲的果實便是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俄羅斯藝術界中嶄露頭角之「巡迴展覽畫派」。

⁷³ 世界美術史，山東美術出版社，1991年，頁278。

⁷⁴ 車爾尼雪夫斯基，藝術與現實的美學關係。

<http://www.yifan.net/yihe/novels/zatan/ysyxsdmxgx/mx.html>

⁷⁵ 其成員包括巴拉基列夫（М.А. Балакирев, 1837-1910）、鮑羅定（А.П. Бородин, 1833-1887）、穆索爾斯基（М.П. Мусоргский, 1839-1881）、林姆斯基·高沙可夫（Н.А. 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 1844-1908）以及庫宜（Ц.А. Кюи, 1835-1918）。

⁷⁶ Островский Г., Рассказ о русской живописи, М.: Изобразитель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1989, с. 148.

二、俄羅斯「巡迴展覽畫派」(Передвижничество,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передвижных выставок)之成立

十九世紀後半期俄羅斯繪畫創作由「巡迴展覽畫派」(1870-1924)取代皇家美術學院之地位，成為主流藝術之風格領導。聖彼得堡皇家美術學院(Академия художеств)是伊麗莎白女王(Елизавета Петровна, 1709-1762)於1757年設立的，它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一直是俄羅斯藝術界的最高指導機關。美術學院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要培養一群熟稔西歐古典創作風格的文化菁英，藉此提高俄羅斯的文化水準。當時美術學院只接受6至9歲的貴族小孩前去就讀，並以全盤西歐式的繪畫教學訓練，因而深受當時西歐古典主義藝術發展的影響，在繪畫創作上主要以古希臘羅馬神話、歷史以及聖經題材為主，並以此作為畢業創作比賽之主題，榮獲大金質獎章的學生，還能公費前往歐洲繼續深造六年。到了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美術學院的發展動向完全納入沙皇嚴格的審查制度之下，不僅題材創作上必須出符合沙皇的喜好，學生的日常生活作息也時時被監督著。甚至以公費身份前往歐洲深造的學生，其很大的任務之一是去仿製沙皇指派的歐洲大師作品。藝術家沒有題材發揮的可能性，與其將他們稱之為藝術家，不如將之形容為“國家栽培的繪畫工具”來的貼切。但是保守的學院派創作風格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受到當時西歐各種社會思潮的影響早已逐漸改變，同時隨著俄羅斯教育制度的改革，皇家美術學院開始招收社會其他階層，例如官吏、商人、甚至是農奴的小孩。貴族子弟與來自俄羅斯偏遠各地的中下階層小孩共聚一堂學習的情形，逐漸使皇家美術學院保守的創作風格接受挑戰。來自社會中下階層的美術學院畫家們，除了生長環境與貴族子弟全然迥異之外，他們更把自己的思考模式帶入繪畫創作題材上，熱愛對自身現實生活情景之描繪。十九世紀初期出生於貧窮小商人家庭的維涅齊昂諾夫(А.Г. Венецианов, 1780-1847)便是當時致力於描繪俄羅斯自然風光與農民生活之重要畫家，他更興辦美術繪畫學校，資助農奴子弟學畫，他對於藝術應表現真實生活的認知，開啟了俄羅斯風俗畫之新氣象。到了1840

年左右，畫家費多托夫更以他極具戲劇性的諷刺畫揭露沙皇專制暴政、貴族生活之迂腐以及對市井小民之同情，揭開了俄羅斯十九世紀後半期批判現實主義之精神。尤其，十九世紀後半期平民知識份子的崛起更為藝術界現實主義風潮之興盛帶來關鍵性之因素，捍衛現實主義的藝術評論家史塔索夫曾說：「俄羅斯最傑出的畫家，大多數來自社會低階層的子弟。」⁷⁷而在稍後將提到的美術學院“十四人叛亂”事件，其中的十四名學生也有一人來自貴族階層⁷⁸。面對俄羅斯藝術界的現實主義趨勢之發展，美術學院曾以嘗試的心態開放風俗畫題材之創作，1862年，美術學院允許風俗畫作為學生畢業繪畫創作之主題，但是該自由的作風隨即在隔年取消。1863年，應當參加該屆畢業創作比賽的14名學生，拒絕接受學院指定的北歐神話題材創作，義憤填膺地離開美術學院自組“彼得堡藝術家協會”（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Артель Художников），這便是俄羅斯藝術史上著名的“十四人叛亂”（Вунт четырнадцати）。離開美術學院的14名藝術家以克拉姆斯科依（И. Н. Крамской, 1837-1887）為首⁷⁹，並依照車爾尼雪夫斯基小說《怎麼辦？》中所描述的“公社”（коммуна）方式集體生活。每當夏天，成員們各自回到鄉間寫生作畫，冬天再聚集一起從事新的創作並討論藝術相關議題。克拉姆斯科依贊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觀點，視藝術家應以繪畫表現形式作為社會事件評論家，從中反映出個人的世界觀及其喜好與厭惡；且最重要的是，那些理念將會使繪畫作品容光煥發。沒有這樣的光澤，藝術家毫無立足之地。⁸⁰藝術家協會的自由創作風氣便是促使「巡迴展覽畫派」成立之推動因素。1870年，克拉姆斯科依與馬塞耶多夫（Г. Г. Мясоедов, 1834-1911）協同一些莫斯科的藝術家商

⁷⁷ Elizabeth Kridl Valkenier, *Russian realist art: the state and society. The Peredvizhniki and Their Tradition*. Michigan: Ann Arbor, p. 11.

⁷⁸ Ibid.

⁷⁹ 其他13名學生分別是畫家馬可夫斯基（К. Маковский）、得米特利耶夫-奧連布爾格斯基（Н. Дмитриев-Оренбургский）、馬洛薩夫（А. Морозов）、卡爾祖辛（А. Корузухин）、盧拉夫列夫（Ф. Журавлев）、列莫赫（К. Лемох）、利達夫臣卡（А. Литовченко）、別斯科夫（М. Песков）、彼得羅夫（Н. Петров）舒斯妥夫（Н. Шустов）、別尼格（Б. Вениг）、格裡高爾耶夫（А. Григорьев）以及雕塑家科列以坦（В. Крейтан）。

⁸⁰ Рус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во II половин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http://www.countries.ru/library/countries/russia/dolgov/history2_13.html

訂組織「巡迴展覽畫派」的章程，當中提到：「在所有沙皇國土上的巡迴展覽是為了使全國各地的人民都有接觸俄羅斯藝術的可能性並認同他的成就，同時在社會中發展普遍對藝術的喜好…」⁸¹從這一刻起，俄羅斯的藝術作品從美術學院與私人畫廊中走出，遵循著批判現實主義創作的風格，巡迴展覽派畫家真實地描繪俄羅斯人民的歷史、社會、生活和大自然，揭露沙俄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史塔索夫對於「巡迴展覽畫派」的建立振奮地說道：「一小群無依無靠、脆弱的年輕藝術家，完成了偉大且深具力量的事件，這是俄羅斯藝術的朝霞。」⁸²「巡迴展覽畫派」開啟了十九世紀後半期俄羅斯繪畫題材之批判現實主義，其涉及俄國正在發展的資本主義、多方面展示了俄國的社會狀況，它們對現實矛盾的揭露具有相當的深度，並提出了許多重大的社會問題。對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之後蓬勃發展的俄羅斯藝文，列寧說道：「俄羅斯的生命從長期的道德與智力沈睡中甦醒、豁然頓悟。它想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清除存在於過往無用的殘渣與守舊之元素，使到處佈滿嶄新俄羅斯思想中的清新與活力。」⁸³

三、「巡迴展覽畫派」的繪畫特色及題材發展

1860 年代俄羅斯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挫敗以及隨之的農奴解放改革後，俄羅斯社會的落後矛盾現象並沒有隨之改善，在此情況下，激進革命知識份子的理念為當時年輕平民知識份子藝術家所青睞，因而最早期的「巡迴展覽畫派」藝術家之創作理念以深切反應沙皇專制制度下矛盾的社會現象與人民悲苦的生活為主要訴求。但是在 1870 年代以後民粹主義之理念迅速發展，同時又有國家保守主義者提出以俄羅斯東正教信仰重建社會道德之理念，因而後一代的「巡迴展覽畫派」藝術家之題材創作，除了繼續追求社會改革之動力，更多元化的表現出藝術創作中的愛國熱忱與民族精神。然而不管在「巡迴展覽畫派」發展的那個階段，其繪畫創作主要特色則不出畫家愛國情感之體現、繪畫主體之典型性以及題材內

⁸¹ Островский Г., Рассказ о русской живописи, М.: Изобразитель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1989, с. 167.

⁸² Лебедев А.К., Солодовников А.В., В.В. Стасов,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82, с. 72.

⁸³ Белоусова С.С., Русская музыка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М.: РОСМЭН, 2003, с. 6.

容之時事性這三個範籌⁸⁴。首先在畫家情感表現方面，列賓認為：「所有畫家必定認同自己作品中所描繪之情境與意涵…。觀眾無需去評斷作品之好壞，只需簡單地融入作品中之畫面、人物與情節」⁸⁵。畫家的個人情感是對現實反應最生動的表達方式，克拉姆斯科依更認為：「藝術的目的並非予以受生活磨難之艱苦觀眾平靜的心靈撫慰作用」⁸⁶，透過畫家情緒的真切表達，藝術才能觸動心靈、喚起人民對自身生活之意識。因而身為「巡迴展覽畫派」之員，若非懷有對國家人民深切之熱愛，其所創作出來的作品便無法撼動人心。其次，在「巡迴展覽畫派」的內容呈現上，主要強調繪畫主體之典型性而非特殊單一性。別林斯基在他的現實主義美學觀點中曾強調，“典型化”的創作可以為現實帶來更多的真實⁸⁷，這樣的概念清楚說明了“典型化”之重要性。所謂“典型化”便是藝術家以敏銳的觀察力描繪主體之本質特徵，將原本單一分散的素材融入同一畫面當中，體現出整個時代氛圍與精神，其中的意義是整個國家民族性的，而非僅止於個人創作喜好之表現。「巡迴展覽畫派」創始人之一米塞耶多夫在 1870 年代寫到：「畫家必須以宏觀的態度看待自己的繪畫創作目的，將數個獨立的個體與事件予以歸納，真實地以個體表現出整體」⁸⁸。例如在他的作品《閱讀 1861 年二月十九日的宣言》（«Чтение манифеста 19 февраля 1861 года», 1873）中，一群農民圍繞著一位識字的年輕男孩，聆聽他閱讀著農奴解放宣言。透過細節的服裝、神情描寫，米亞塞耶多夫典型的表現出各種農民身份對於解放宣言之感受。另外，在雅羅申科（Н.А. Ярошенко, 1846-1898）的作品《司爐工》（Кочегар, 1878）與《高等女校生》（Курсистка, 1883）當中，則深刻地塑造出工人形象與 70-80 年代先進知識份子的女性典型，這些都說明了“典型化”在「巡迴展覽畫派」創作特色上之凸顯。

⁸⁴ Elizabeth Kridl Valkenier, *Russian realist art: the state and society. The Peredvizhniki and Their Tradition*. Michigan: Ann Arbor, p. 93.

⁸⁵ *Ibid*, p. 94.

⁸⁶ *Ibid*, p. 93.

⁸⁷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人民出版社，1979，頁 692。

⁸⁸ Elizabeth Kridl Valkenier, *Russian realist art: the state and society. The Peredvizhniki and Their Tradition*. Michigan: Ann Arbor, p. 94.

最後，在「巡迴展覽畫派」中的創作特色是題材的時事性，其反應時代變遷、政治、經濟、社會快速變動的時代下所衍生之當代社會問題與現實生活，或者透過歷史、聖經題材來說明俄羅斯國家歷史命運當中，永恆存在的對立矛盾性問題。

而對於「巡迴展覽畫派」創作理念的進一步瞭解，則必須提到其主要的評論與發言人史塔索夫。史塔索夫是當時著名的文學、音樂以及藝術評論者，他認為現實主義不該只是對現實具體的反映，他同時強調繪畫當中的國家性與人民特色。所謂的國家性便是俄羅斯的現實主義應該有別於西歐國家的現實主義；而人民特色則是強調對於俄羅斯人民生活的描寫，同時喚起社會對苦難農民階層之關注，上述這兩點環環相扣，構成俄羅斯現實主義之獨特性。⁸⁹基於這樣的訴求理念，我們可以在早期的「巡迴展覽畫派」藝術家作品中，觀察到畫家力求真實反應農村的貧困、落後與人民對生活的無力感。例如彼羅夫(В.Г. Перов, 1833-1882)的作品《送葬》(Проводы покойника, 1865)、《三頭馬車》(Тройка, 1866)以及佩利尼什尼可夫(И.М. Прянишников, 1840-1894)的《馬車》(Порожники, 1872)、《火災》(Погорелье, 1871)透過人民的日常生活模式來描繪沒有覺醒、貧困的俄羅斯社會與人民之悲哀。然而隨著國內“六十年代”的革命精神轉而由七十年代的民粹主義風潮領導，擁有教育素養的俄羅斯知識份子不再認為自己擁有解放俄羅斯的能力，他們轉而將希望寄託於廣大農民身上，1860年代革命思潮代表者彼薩列夫曾斷言：「俄羅斯人民之命運決定於大學而非地方學校」⁹⁰已於70年代民粹運動興盛之際粉碎，取而代之的是知識份子對廣大人民之崇拜；與此同時，在國外情勢發展上，俄羅斯以解放巴爾幹斯拉夫民族之旗號發動對土耳其的戰爭(1877-78)，造成俄羅斯社會中瀰漫著一股斯拉夫民族精神高漲之氣氛。上述俄羅斯知識份子在國內政治中，對俄羅斯人民產生的崇拜情感以及社會中因國家對外戰爭中所引燃的斯拉夫民族使命感之理念，對於「巡迴展覽畫派」藝術家的創作理念產生深遠的影響，而所謂的影響並非代表藝術家們在政治意識

⁸⁹ Valkenier Elizabeth, Russian realist art: the state and society, The Peredvizhniki and Their Tradition, Michigan: Ardic, 1997, p. 57.

⁹⁰ Ibid, p. 69.

上轉而崇尚民粹主義運動或是他們贊同俄羅斯對巴爾幹斯拉夫民族解放之政治干涉，而是在題材創作上產生更廣泛的國家民族現實思考問題。在這段期間俄羅斯「巡迴展覽畫派」的現實主義藝術家們在作品中所傳遞之概念不再只是社會現象之矛盾與反應改革之主張，而是在更多表現上讚美、維護、凸顯俄羅斯民族獨有之精神特色⁹¹。這股風潮反映在「巡迴展覽畫派」的作品中則包括蘇里可夫(В.И. Суриков, 1848-1916)以一系列著名的歷史畫探索人民群眾在歷史進程中的精神表現，另外在他的《女貴族莫洛卓娃》(Боярыня Морозова, 1887)中更可以看到傳統的莫斯科建築、服飾和聖像畫；另外還有許多畫家將保存在人民生活中的民族特色，諸如服裝、物品、建築、儀式等作為創作元素來具體呈現人民生活之面貌，例如馬克西莫夫(В.М. Максимов, 1844-1911)的作品《巫師參加農村的婚禮》(Приход колдуна на крестьянскую свадьбу, 1875)中表現了俄羅斯農村古老的宗法制度，同時民間服裝的雕花裝飾、刺繡圖案、木製器具和其他小屋的陳設方式都出現在畫面當中。然而相較於1870年代之後繪畫作品中“刻意”運用樸實的民間生活元素表現出其中社會性的、道德性的國家民族特色，⁹²在「巡迴展覽畫派」中少數以“民間創作”作為題材發揮之作品，則是另一種國家民族意識復甦之呈現。

四、「巡迴展覽畫派」題材中的民間創作元素

所謂的俄羅斯民間創作(фольклор)代表一種人民智慧之表現，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一般將之稱為民間文學(народн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或民間史詩(народная поэзия)⁹³。另外，對於民間創作還有其他的指稱，例如以“無個性的文學”(безличн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強調民間創作不存在作者個人特色；以“自然的文學”(естественн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或“樸實的文學”(безыскусственн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來說明民間創作的形成無須任何美學理論基礎。十九世紀末二十

⁹¹ Ibid, p. 72.

⁹² Alison Hilton, *Russian Folk Ar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16.

⁹³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http://feb-web.ru/feb/litenc/encyclp/le2/le2-0011.htm>.

世紀初出現了“口頭文學”(устн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來指稱民間創作，更加凸顯不識字、沒有書寫能力的人民以口頭傳唱的方式來表現以及流傳民間創作。⁹⁴顧名思義，民間創作主要由人民做為創作者，其日常生活模式以及世界觀充分的以歌謠、俗語、謎語、勇士讚歌以及傳說故事等形式表現出來。而民間創作運用在藝術表現當中，從十九世紀前半期作家茹科夫斯基(В.А. Жуковский, 1783-1852)、普希金以及果戈里的作品當中都可以窺見，而當時崇尚俄羅斯民族精神之斯拉夫派者，如基里耶夫斯基(П. В. Киреевский, 1808-1856)更積極地收集俄羅斯民間創作歌謠，大大提高了學界對於民間創作研究之風氣⁹⁵。這段期間出版關於俄羅斯民間創作的重要作品包括：達利(В. И. Даль, 1801-1872)的《俄羅斯民間諺語》(«Пословиц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阿法納西耶夫(А. Н. Афанасьев, 1826-1871)的《俄羅斯民間童話》(«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以及基爾費爾金卡(А. Ф. Гильфердинг, 1831-1872)的勇士讚歌集等。尤其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從文學創作到民族學、語言學以及歷史考古等面向，對於俄羅斯民族文化研究之熱情持續高漲著，民間創作被視為是俄羅斯獨有精神之表現。作家托爾斯泰(А.Н. Толстой, 1829-1910)便認為，民間創作是研究人民心理層面與當時社會狀態之重要依據，在當中包含人民主要的生活價值觀，關於勞動、家庭、愛以及祖國。俄羅斯民間創作的最大意義，可以讓我們瞭解真正的俄羅斯民族，當然，也讓我們瞭解自己。當代人對於民間創作缺乏興趣，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對於傳統文化的陌生以及對於民間儀式、歌曲、裝飾內容之豐富象徵意涵之不理解。而缺乏了對這些傳統精神的認知，便無法衡量與認同當中的美。因而透過對民間音樂、圖像或舞蹈的再現，是讓當代人理解民間創作遺產之重要方式。⁹⁶對於俄羅斯民間創作之意義，蘇聯時期作家高爾基認為：「這些絕妙的創作，是物質與精神文化當中出色之表徵。」⁹⁷同時他又說道，俄羅斯人民創作出宏偉的口述文學：睿智的諺語、機靈的謎語、歡欣與哀傷的歌謠、幻想逗趣的童話，以

⁹⁴ Аникин В.П., Русский Фольклор,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7, с. 6.

⁹⁵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http://feb-web.ru/feb/litenc/encyclp/le2/le2-0011.htm>.

⁹⁶ Витальевны П. Е., Фольклор, <http://referat.ru/document/7886>.

⁹⁷ Кравцов Н. И., Лазутин С. Г., Русское устное народ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77, с. 11.

及捍衛國家土地之俄羅斯勇士讚歌。民間創作中形繪出深具內涵且亮眼的人物角色典型，所有這些人物表現出人民意識當中所兼具的直覺、意念與感受。同時民間創作是最早的藝術語言，當中提供我們豐富的創作材料。當我們愈瞭解過往，我們將愈容易也愈欣喜於找尋到先祖們創作精神中偉大的意涵。⁹⁸

民間創作的備受重視，在當時許多的藝術表現皆以此作為創作靈感之來源，例如在文學創作方面，列夫·托爾斯泰在其寫作的兒童讀物中大量運用民間題材；阿列克賽·托爾斯泰（А. К. Толстой, 1817-1875）創作了許多關於俄羅斯勇士的敘事詩；而奧斯特羅夫斯基（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1823-1886）則以俄羅斯民間故事《雪姑娘》（Снегурочка）為構想，寫作了同名劇本⁹⁹；在音樂作品中，包羅定的《伊戈爾大公》（Князь Игорь）、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雪姑娘》與《金公雞》（Золотой петушок）等都是直接取材於民間創作。而在「巡迴展覽畫派」藝術家當中以民間創作作為題材發揮者，包括列賓的《薩德闊》（Садко）、彼羅夫晚期的作品《雪姑娘》（Снегурочка）和《伊凡王子與依蓮娜》（Иван-царевич и Елена Прекрасная）以及克拉姆斯科依的《五月夜晚》（Майская ночь）等，且由於瓦斯涅佐夫扮演了積極開創性之角色，更帶動了後一輩的畫家諸如弗魯貝爾（М.А. Врубель, 1856-1910）、波列諾娃（Е.Д. Поленова, 1850-1898）、列利賀（Н.К. Рерих, 1874-1947）以及比利賓（И.Я. Билибин, 1876-1942）等人在民間創作題材運用上之特殊表現。1870 年代之後以民間歌謠、童話故事、勇士讚歌作為繪畫題材，這樣的創作表現方式對於平民知識份子的藝術家而言有獨特之意義，儘管這些藝術家不是生長於傳統的農民家庭裡，但是他們的低層社會背景出身卻賦予他們對民間創作之熟悉感。因為感同身受，在畫家筆下所描繪出的自然風景、人物角色等，不單單只是為創作而創作，更是訴諸於自己的情感表達對周遭環境的熱愛。同時在民間創作當中所賦予的詩意與浪漫情懷，更提供創作者對國家民族情感發揮之想像空間，而造就了俄羅斯現實主義繪畫語言表現之時代突破性。

⁹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фольклор, <http://feb-web.ru/feb/litenc/encyclp/le2/le2-0011.htm>.

⁹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Третьяковская Галерея, Москва,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1848-1926) - каталог выставки, Л.: Аврора, 1990, с. 52.